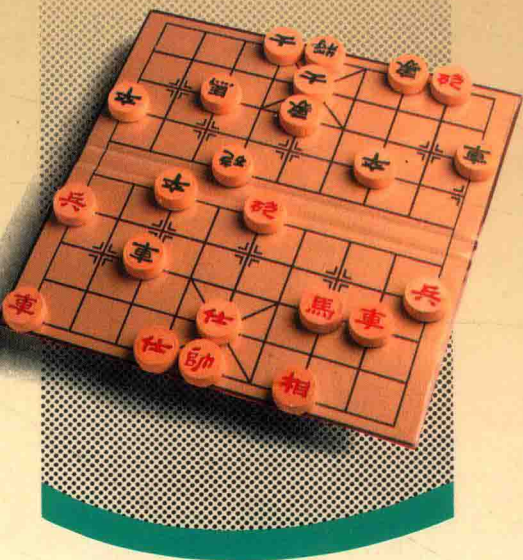


90
商務印書館



胡適政論與近代中國

沈寂著・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胡適政論 與近代中國

胡適政論與近代中國／沈寂著． -- 臺灣初版

． -- 臺北市：臺灣商務，1994 [民83]

面；公分． -- (商務玖什叢書；16)

ISBN 957-05-0933-3 (平裝)

1. 胡適 - 學術思想 - 政治

570.928

83005088

商務玖什叢書 016

胡適政論與近代中國

定價新臺幣 180 元

著 作 者 沈 寂

責 任 編 輯 曾慶慈

發 行 人 張 連 生

出 版 者 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

電話：(02)3116118・3115538

傳真：(02)3710274

郵政劃撥：0000165-1 號

出版事業：局版臺業字第 0836 號
登 記 證

• 1993 年 10 月香港初版

• 1994 年 7 月臺灣初版第一次印刷

本書經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授權本館在臺灣地區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05-0933-3 (平裝)

b 43107000

玖 jǐu / 粵音 ^ckɔu 本義

似玉的美石：貽我
佩玖 段注 數目字九的大
寫

什 shí / 粵音 sep 本義

由十個單位合成的一組：古代兵制十人為什 段注 篇什：詩經雅頌十篇為一什：後用以泛指詩篇文卷 段注 多種而雜樣的：家什 別義 通數目字十：多指十成或十倍

商務玖什叢書

胡適政論 與近代中國

沈寂 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總 序

我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傳統糾纏着。在這個糾纏的過程中，有人要與傳統徹底決裂；有人要默默繼承；有人要批判地重建；也有人要“解構”(deconstruct)傳統，開闢未來。當中的爭論此起彼落，莫衷一是，但回顧百多年來我們對這問題的主流傾向，恐怕和“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”這個折衷方案仍然相去不遠。

或許，文明的演進，就是以這種“進三步、退兩步”的舞姿，在躊躇兜轉。在這條迂迴的路徑上，我們要踏得實在，但這並非意味我們可以原地踏步。我們更不應睥睨“更新”的觀念；因為新的理論觀念，正是進一步實踐的基石。

尤其不可忽略的是，在與“傳統”糾纏的過程中，我們總要不斷地對“傳統”作出新的詮釋及理解，以能更準確地掌握我們身處的位置。在主流的論述中，往往只以過去曾存在的文化作為“傳統”。這不是一套完整的觀念，因為我們不能單

看傳統裏“有”的文化，而忽略了傳統裏“無”的文化。若我們是認真及負責任地思考傳統，我們就不能只看“昨天所有”，而不注意“昨天所無”了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商務印書館的《玖什叢書》，就是建基於檢討“昨天所有”，同時又寄望於“昨天所無”之上。回頭看一看歷史，商務印書館也與“傳統”糾纏了很多年。本館於1897年成立時，中國正處於風雨飄搖、存亡絕續的時代。在這個形勢危急的關鍵時刻，一羣知識分子努力求取新知，主張變革圖存，於是以3,750元的資金，成立了中國近代歷史最悠久的出版印刷機構。他們的出發點，就是反省傳統文化，引介學術新觀點，及反映社會思潮新動向。我們出版《玖什叢書》的目的，就是紀念這九十年的歷史，並具體表示我們是實質地接上這根文化理想的棒子。

對於文化的熱情，昨天固然有，今天仍將繼續。

但昨天潛藏的問題，今天也逐漸湧現，而且直壓現代人的心靈。昨天的世界，還未被“灰色”所籠罩；昨天的文化，還未出現“後現代的困局”；昨天的政權，還沒有“合法性的危機”(legitimation crisis)；昨天的經濟系統，還沒有面對

過全盤崩潰的威脅。這些未必是全“新”的問題，或許只是老問題的新版本，但時移世易，“問題”所處的環境改變了，它就有了另一重意義。面對“新”問題，我們不單要反省及挑戰已有的方法及觀念，還要探索“昨天所無”的，並勇於做一個“進步分子”。

在這層意義上，《玖什叢書》雖然未必能夠緊跟上，但也一直嘗試朝着這個方向進發。這套叢書不但嘗試深入淺出、簡明扼要地帶出哲學、社會科學及文化的新觀點，以切合當代的需要，更希望能再進一步，多元化地開拓“未來所有”的思潮。

且讓我們以踏實的腳步邁進九十年代，讓我們在兜轉而前進的旅程中，反省“昨天所有”，探索“昨天所無”，一同玩味“玖”“什”。

商務印書館

編輯部

目 錄

一	引言	1
二	留學美國的訓練（1910——1917）	23
	1 課堂教育與實際參與	23
	2 杜威的影響	28
	3 “和平主義”思想的形成	32
三	北洋政府時期的“新努力”	47
	1 政論的導言——問題與主義之爭	47
	2 努力會與好政府主義	60
四	對不同政見的爭鳴與選擇	73
	1 與社會主義者爭鳴	73
	2 實驗主義的蘇、美觀	86
五	與國民黨的較量與相知	93
	1 國共分裂以後的新抉擇	93
	2 “人權”問題的衝突	100

3	較量而後相知	114
4	制憲時期的民主與獨裁之辯	128
5	社會的重心與國民黨的作用	153
六	在野幫政府的忙	177
1	不願作“政府的尾巴”	177
2	在學生運動中	193
3	對冷戰世界的意見	209
七	尾聲	231
1	在流亡中反思	231
2	“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”	240

一 引 言

過去都說胡適是全盤西化論者，其實這是一種誤解。

胡適自幼接受程朱理學思想，幾乎終身不渝。他由舊學而新學及至洋學，只為一個目標：充分吸取現代文化，使之與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華協調一致，從而推陳出新。

胡適（1891—1962），幼名嗣糜，昵稱糜兒。又名洪驊。安徽績溪上莊人。父親胡傳（鐵花），曾任臺灣臺東直隸州知州等職，是個理學家。母親馮順弟，出身農家，是胡傳的續弦。胡適五歲喪父，由身兼慈母與嚴父的母親撫養成長。胡適在父親去世那一年入學，因當時他已認得近一千個字，並能說出每個字的意思，已不屬破蒙的學生，無須讀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神童詩》一類的蒙學讀本。在九年的家鄉教育中，胡適除閱讀了他父親生前專為他準備的教材《學為人詩》、《律

詩六鈔》、《原學》等外，還閱讀了一般規定的書籍，如《四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、《易經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孝經》等經籍，以及朱子的《小學》、《幼學瓊林》等。由於他母親以重金優惠的“政策”，要求學塾老師對胡適講書，必須跟其父胡傳教他認字解義一樣，所以胡適的學業進步很快。課外還偷讀了不少古典小說（多半是白話的）。1904年，他轉到上海入新學堂，先後入讀過梅溪學堂、澄衷學堂和中國公學。

在上海，胡適重點學的是新學。他的國文程度已超過新學堂學生的水平。不過在上海的新學堂裏，胡適的知識面大為擴大；他知道在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之外，中國還有學術思想，由是他開始涉獵“中國上古、中古幾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學家的著作，並欣賞墨翟的兼愛說與老子、莊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學”，^①他更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、很高等的文化。這是在窮山溝裏聞所未聞的新世界。

除課堂教育外，胡適此時還從林紓等人的翻譯小說中“認識一大批英國和歐洲的小說家，司各提（Scott）、狄更司（Dickens）、大小仲馬（Dumas père et fils）、囂俄（Hugo，今譯雨果）以及托爾斯泰（Tolstoy）等氏”。從梁啟超的

文章中，又“漸得略知霍布士（Hobbes）、笛卡兒（Descartes）、盧騷（Rousseau）、賓坦（Bentham，今譯“邊沁”）、康德（Kant）、達爾文（Darwin）等諸泰西思想家”。梁啟超給他提出這樣的問題：“中國人以一個民族而言，對於歐洲人所具的許多良好特性，感受缺乏；顯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，國家思想，愛冒險，私人權利觀念與熱心防其被侵，愛自由，自治能力，結合的本事與組織的努力，注意身體的培養與健康等。”同時，胡適在讀嚴復譯的穆勒（John Stuart Mill）的《自由論》（On Liberty）和赫胥黎（Huxley）的《天演論》（Evolution and Ethic）之後，認為把達爾文的言論運用在社會上與政治上，“對於一個感受惰性與濡滯日久的民族，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”。^②個人與國家均應以進化論警惕在生存競爭中的命運。當時中國公學《競業旬報》的刊名中有些人的名號，以及胡適自己取“適之”為號，都是進化論影響下的產物。胡適當時接受進化論思想，很快就從《列子·說符》所載的故事中，發現二千年前有一個與他一樣年輕，抱同樣信仰的人，使他“童心歡悅”：

“齊田氏祖於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獻魚雁者，田氏視之，乃歎曰：‘天之于民厚矣！殖

五穀，生魚鳥以爲之用。'衆客和之如響。鮑氏之子，年十二，預于次，進曰：'不如君言。天地萬物，與我並生，類也。類無貴賤，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，非相爲而生之，人取食者而食之，豈天本爲人而生之？且蚊蚋噬膚，虎狼食肉，豈天本爲蚊蚋生人，虎狼生肉者哉？" ③

這是古代思想家的自然（主義）學說，後來爲理學家所因襲。胡適在上海接觸到近代的自然科學知識，立即就開始以淺近的常識來解釋、發揚這古老的自然主義學說。

胡適在上海讀書的時候，西學的概念已由船堅砲利之器，擴及制度與觀念等上層建築以及意識形態。但是胡適在赴美留學時，他的二哥卻仍叮嚀他：“學點有用的技藝。文藝、哲學是沒有甚麼實用的。” ④說明技藝救國論仍有其餘威，政體、國制、倫理等方面的近代化，尚未爲社會所充分重視。胡適留美之初，進的是康乃爾大學的農學院，讀了一年半以後，才又轉入文理學院，最後選擇哲學爲自己的專業。胡適留美七年，於學成歸國的前夕，以詩敘述了這段經歷：

我初來此邦，所志在耕種。文章真小技，救國不中用。帶來千卷書，一一盡分送。種菜與種

樹，往往來入夢。

忽忽復幾時，忽大笑吾癡。救國千萬事，何一不當爲？而吾性所適，僅有一二宜。逆天而拂性，所得終希微。

從此改所業，講學復議政。故國方新造，紛爭久未定；學以濟時艱，要與時相應。文章盛世事，豈今所當問？⑤

其實，胡適當時雖置身在農學院，卻從未放棄過對哲學與文學的探索。他開始研究由國內帶來的《十三經注疏》，與漢學打交道。自幼受宋學薰陶的胡適，此時爲宋、漢“兩派之間顯明的差異炫惑了”。⑥於是他把中國傳統的校勘、訓詁、考據之學與西方“版本學”和“有系統的推理思考理論”相結合，兼收並蓄，使之形成“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”。⑦胡適自稱他早期對宋學中朱注的認識和訓練，爲他後來“治漢學開拓了道路”。⑧胡適是以哲學性詮釋的宋學爲本，以漢學的治學方法及西方的治學方法爲用的。

胡適在美國留心學習的，是中國當時最需要的。據他的觀察，“今日吾國之急需，不在新奇之學說、高深之哲理，而在所以求學、論事、觀物、經國之術。以吾所見言之，有三術焉，皆起死之神丹也：一曰歸納的理論；二曰歷史的眼光；三曰進

化的觀念。”^⑨同時關心“泰西的考據學”、“致用哲學”，以及“天賦人權”等學說^⑩。在他由康乃爾即將轉往哥倫比亞大學前幾個月，在日記中寫道：“吾生平大過，在於求博而不務精，蓋吾返觀國勢，每以爲今日祖國事事需人，吾不可不周知博覽，以爲他日國人導師之預備。不知此謬想也。吾讀書十餘年，乃猶不明分功易事之義乎？吾生精力有限，不能萬知而萬能。吾所貢獻於社會者，惟在吾擇業耳。吾之天職，吾對於社會之責任，唯在竭吾所能，爲吾所能爲。吾所不能，人其捨諸？自今以往，當屏絕萬事，專治哲學，中西兼治，此吾所擇業也。”^⑪

胡適的思想，在留美期間成熟定型，但其雛型卻是在上海的新學堂和九年的家鄉教育時就奠定的。如他說：“‘學原于思’一句話是我在澄衷學堂讀朱子《近思錄》時注意到的。我後來的思想走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，也正是因爲我從十幾歲時就那樣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。”又如他在上海曾撰寫過《論承繼之不近人情》一文，“最初起於我小時看見我的三哥出繼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，是從一個真問題上慢慢提出來的一些結論。這一點種子，在四五年後，我因讀培根（Bacon）的論文有點感觸。在日記裏寫成我的‘無後主義。’^⑫在十年以

後，又因為我母親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，我才寫成《不朽：我的宗教》一文，發揮‘社會不朽’的思想。”^⑬如再往深處追根，還得歸到胡適的母親與父親對他的教育與影響。他說：“我母親的活動從未超出家庭間瑣屑細事之外，但是她的左右力，能清清楚楚地從來弔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臉上看得出來。我檢閱我已死的母親的生平，我追憶我父親個人對她畢生左右的力量，及其對我本身垂久的影響，我遂誠信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。”^⑭

蔡元培先生說胡適“稟有‘漢學’遺傳性”。^⑮梁啟超說“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，亦用清儒方法治學，有正統派遺風”。^⑯唐德剛說得乾脆：“胡適之先生骨子裏實在是位理學家。”“用胡先生自己的學術分期來說，則胡適之便是自己所說的‘現代期’的最後一人。”^⑰事實是否如此，還是由胡適自己回答。胡適說中國的知識分子，現在“大有傾向陸、王的趨勢。有提倡‘內心生活’的，有高談‘良知哲學’的，有提倡‘唯識論’的，有用‘直覺’說仁的，有主張‘唯情哲學’的。倭鏗（Eucken）與柏格森（Bergson）都作了陸、王的援兵。……到了歧路之上……。我們還是‘好高而就易’，甘心用‘內心生活’、‘精神文明’一類的揣度影響之談來自欺欺人呢？還是決心不怕艱難，選擇那純粹理智態度的崎